

# 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福建风水文化

——评陈进国著《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侯杰 刘宇聪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2005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75.7万字，包括《绪论》和《余论》在内共有8章。

这部学术专著是以福建为地域背景的风水文化作为研究主题的。风水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应当将风水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一书即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一书主要是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下，从风水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风水构成的民间信仰世界、风水信仰与乡土社会中士绅的关系、风水与家族系谱的关联等方面，对包括知识、观念和信仰在内的福建风水文化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

作者首先将风水信仰置于当地移民开发进程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对这一民众信仰习俗与近世以来乡土社会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加以宏观考察。作者认为，在走向“土著化”的过程中，汉族移民借助风水观念、信仰，有效地影响和改变了在当地弥漫的“信巫尚祀”的氛围，完成了“因土成俗”的意义转换，确立了“在地意识”。同时，随着聚居形态的发展和人地矛盾的加剧，乡土社会中的乡族意识也得以不断滋长、蔓延，并由此导致了当地有限的风水象征资本的争夺。这无疑是现实矛盾深刻影响民间信仰形态的重要表现。

该书对于中国近世风水流派中早已约定俗成的群体“在地意识”认同予以了高度重视。作者非常巧妙地结合了社会史和数术史研究，对理气派（闽派）和形法派（赣派）在近世以来乡土社会的地域扩展进程中的互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为我们呈现出两大风水流派既相抗又兼容的总体态势，特别是风水在区域信仰情态中的文化意义。作者对理气派和形法派的观念系谱特质以及人文意义进行了现象学式的描述，进而反思两者是如何在“信仰化”的实践中达成“在地化”的文化表述，并逐渐从分庭抗礼走向有机整合，构成一般意义上的风水知识和风水认知的。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还通过与风水专家的“对话”，努力把握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基本文化态度和价值判断。

在作者看来，风水流派意识在民间走向模糊化的趋势，说明风水本身已经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民间信仰或民俗知识，成为近世以来乡土社会一股重要的文化整合力量和区域认同意识的文化象征催化剂，从而突显了中国的神灵祭祀传统的惊人渗透力。作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信仰上，对风水知识、观念为乡土社会所承认、接受并转变为民俗信仰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作者从构成近世以来福建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之环的通书、灵签、安镇符咒、竖造及丧葬仪式、乩示文本等入手，细致地分析了风水知识、观念是如何借助相关的巫术—宗教仪式，逐步成为一种当地民俗信仰的。正是这些与风水相关的仪式行为，造成了乡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聚态反应，并在其中发挥

了价值转换和意义再生的关键作用。此外，在传统礼教或祭祀观念“以家达乡”的过程中，风水先生、择日师、礼生等充分扮演着“文化媒人”的角色，甚至是第一媒介者。作者所征引的大量极具价值的有关风水的文献资料涵盖了从古至今的考古资料、风水方技之书、方志、家谱、族谱，通书、灵签、符篆、乩文等，而私人笔记、访谈记录、照片等资料则更显示了作者在田野调查上所下的功夫——这无疑也是该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作者认识到，要探讨中国传统风水观念、信仰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方面的异化能力，必须从历史上的信仰主体——不同阶层在风水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相应的心态变迁入手，因而有必要对士绅阶层这一更有自觉反思能力的文化群体进行专门的分析和探讨。士绅阶层是一个积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文化群体，并且更有智慧来充分接受和利用思想观念的社会作用，他们在将风水知识、观念内化为自身信仰的同时，也将其意识形态化，以使区域的公共或私人场域充盈着自身所赋予的意义与价值。作者思考了风水知识、观念是如何成为一种沟通精英与俗民、王朝（国家）与社会的文化桥梁的问题，并对其影响福建地方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作者指出，近世以来的士绅阶层的观念并非铁板一块，但他们同庶民一样对风水都有着共同的信仰，也都把风水当作是一种工具性的需求。对于这一阶层而言，“义”（理）字只是一种带有表演成分的集体表象，“利”（欲）字才是他们灵魂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模式部分地受到了风水观念图式的制约和安排，从而在“破坏/整合”的向力之中维持其动态的平衡。从这一意义上看，细部地解析风水观念、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家族发展的关联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该书在这一方面也显现出了颇为深厚的研究功力。作者借助契约文书以及典型的家族个案，阐释了风水观念、信仰为家族或房派及乡族势力的发展空间所提供的一整套合理化的文化解释机制和激励创新机制，特别是为宗族的内部整合及乡族的权威控制所提供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祖墓、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与“房/家族”的系谱模式和功能形态有着内在的关系，而风水术本身的房分差别理论以及家族与房之间天然存在着的“凝聚/分裂”张力，参与塑造了祖墓和祠堂的风水崇拜的“箭垛化”效应。

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要求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发生“眼光向下的革命”，也就是在研究对象上更偏重于对下层历史与大众文化的关注。作者是福建永春人，他在书中特别指出，自己在经历了一个对故土环境的陌生化过程后，对“本文化”有意识地认识与研究，有可能接近于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去做“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尝试。作者在“向下看”的同时，还努力融入到福建乡土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努力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这在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中显得尤为重要。

该书中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区域经验”。对风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必须将其纳入到地方性的框架中加以描述和解释。从这一点上看，作者很好地继承了傅衣凌学派的学术传统，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发挥。此乃该书比较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研究中注重个案分析以及对当地人文化及心态的把握，对风水的地域性给予了比较充分的重视，也显示出他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使其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

陈进国博士的导师、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为该书作序时特别对陈进国为了进行田野调查而“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身如转蓬，漂泊不定”的惊人毅力和执着精神大加赞赏。作者通过访谈、拍照等

多种手段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成果自然也是十分显著的。众所周知，田野调查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采集口述资料。该书以风水作为研究对象，对福建乡土社会中文化风俗及其历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赖于对当地人的“询问”。笔者认为，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口述资料的获取及其真实性。该书中所征引的大量的口述、照片资料，无疑都反映出作者在田野调查中是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的。

此外，作者将风水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并同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置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下进行探索，确是极具前瞻性和启发性的。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以完整的研究架构将极为复杂的历史叙述有机地统合起来，使我们更加生动和形象地理解历史上的民间信仰和现实中的社会风俗，由此也可看出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和思维理路的清晰。

（作者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宇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 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概述

张晓翔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逻辑学会、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燕山大学、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杭州佛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15日至16日在中国杭州胜利召开。来自美国、法国、日本、蒙古等多个国家和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因明学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佛教界人士100多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80余篇。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研究的新进展；因明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

（一）文献整理考证方面：沈剑英整理并研究了敦煌发现的净眼的两种因明写卷《略抄》和《后疏》；达哇才仁根据所获得权威藏学前辈整理的文献，结合老藏学家罗桑群培的访问资料，对噶丹赤巴作了一系列的考证和论述。

（二）因明典籍翻译方面：巫白慧根据与《入论》梵文原著的对照，对玄奘法师的译文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韩廷杰对《藏要》本《入论》校注作了一系列述评。

（三）因明理论研究方面：刘培育呼吁国内外学者加强因明研究，发挥因明作用。姚南强阐述了印度从古因明到新因明的论式演变，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论式，并指出科学认识和评价因明论式的逻辑价值是今人不容推辞的职责；姚先生对因明的创新作了进一步的呼吁和探讨。认为因明应该在义理、应用和研究上创新，其中义理创新是因明创新的核心。祁顺来探讨了因明为他比量（推论语）在逻辑推理和论证方面的特征和意义。黄明信对藏传佛教的立宗与口头辩论作了详细论述。郑伟宏对百年来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成果作了一些评述，认为东、西方因明家对陈那新因明的误解对中国因明论著具有重大影响。张晓芒利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对因明与名辩学进行了比较研究。香港大学李润生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对因明中三支比量的本质及其逻辑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述。图·乌力吉介绍了因明自18世纪以来在蒙古的发展状况。吉美桑珠论述了藏传因明的传播和在藏区的发展状